

A large, stylized floral illustration in gold and green. The main flower is a large, multi-petaled bloom with a dark center, surrounded by long, flowing, leaf-like petals.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green color. The illustration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with the flower's head facing right.

1959~1962

四川短篇小说选

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

821
5062

1959—1962

四川短篇小說選

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3年·成都

四川短篇小說选

1959~1962

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編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0\frac{15}{16}$ · 字数 208 千

1963年10月第1版 196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500

編 选 說 明

四川文学工作者在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鼓舞下，几年来滿怀热情地創作了許多优秀的散文特写和短篇小說；这些作品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获得了可喜的收成，受到广大讀者的贊揚，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政策取得的新的胜利。

本会現將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川作者在省内外报刊发表的一部分优秀短篇作品，分別編为《四川短篇小說选》《四川散文特写选》各一集，献給亲爱的讀者們。这两本选集，选入了四川专业和工厂、农村、軍隊、机关、学校不同崗位的业余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在題材、体裁和艺术风格上也各具一定的特色。四川作者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作品，已編有《四川十年短篇小說选》《四川十年散文特写选》，因而沒有重选。

在編选过程中，各报刊編輯部曾經給予我們热情的帮助，謹致謝意。由于担負編选工作的同志水平有限，粗疏的地方可能不少，希望讀者尽量提供宝贵意見。

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

目 录

編选說明 I

天要亮了	李劫人	1
夜 渡	林如櫻	10
紅 玉	馮選求	20
永不雕謝的花朵	黃謀遠	38
你追我赶	沙 汀	71
他們還沒死	柯 崗	90
接班人	曾 克	110
他热爱音乐	火 笛	133

II

我与廖大媽的一段趣事	高 櫻	145
老 周	克 非	154
日出之前	閻樹田	172
山村灯火	陸 榮	188
櫻桃籃里的儿歌	榴 紅	199
草地炊烟	殷 白	212
张小全和他的父亲	余開選	220
舒銀发老汉	紀 朵	228
牛車少年	揭祥麟	236
生产队里的糾紛	劉俊民	249
驛道上	沈 重	269
师 道	李伏伽	282
小交通員	馬識途	301
桂香浓于酒	履 冰	324



天 要 亮 了

李 劫 人

消息越来越好！

胡宗南私党办的《建国日报》居然登载出东路的解放大軍已經打到資中。对于川北方面情形，还有一条措辞很怪的新聞。原文是：“本报訊：国軍为集中保卫大成都，順利进行川西平原大会战，据悉，已将隴南及广元地区之国軍主动撤离，南援川西。剑閣天險，如国軍有守卫必要，仍可在此与南北之敌一拼。外传剑閣已撤守說，尚未經証实。今后国軍战略，应有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之新的觉悟与决心，任何包袱均可丢掉，任何有利形势均不容忽視。”

誰也明白他們這伙“國軍”當然不會“大踏步前進”，也沒有可能“大踏步後退”。南路槍炮聲已經連響了兩三天。口頭傳說二十四軍的隊伍尚在雙流新津一綫同他們作戰哩。

由餐門鋪到牛市口的一段公路，比前幾天顯得更亂。載着各種東西（從汽油到家俱）和載着滿臉疲乏驚惶的婦女小孩的大卡車，還是隔不上半小時便有一大隊，隔不上半小時便有一大隊，哧哩啞嚨地，從東頭馳來，向西頭奔去。

橫倒在公路旁邊干溝中的一輛精緻小臥車，原封不動地躺在那里。平日虎踞場上，見啥都要抓一把的陳大爺，為甚么不叫兄弟伙“去給哥子們撿起來”呢？這真怪了！

陳大爺是抗日戰爭中間，同許多成都市普通居民一樣，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才疏散到這個腰店小場上來的。同時到這個腰店小場上來的，還有一個高大爺。據說，都是一個垮了台的旅長的馬弁。他們住下來不久，就在場上開了兩個碼頭，把場上幾十個青年小伙子都“栽培”做自己的“護腳毛”。場上一般隨着疏散而來的小商小販，因為惹不起他們，“與其吃暗虧，不如吃明虧”，十之九都自行投到陳高兩個大爺名下，請求“栽培”，甘願充當一名“么滿十排”弟兄，每日供奉“舵把子”一些食品，“求一個安樂日子過”。

陳大爺（高大爺好像老實一點兒，諸凡百事都由陳大爺出頭，場上的人幾乎只知有陳大爺而不知有高大爺。）却也有本事。開了碼頭不久，就使這個腰店小場頓然繁榮

起来。他在这場的上下两里，包开了三十几家鴉片烟館，十几处各式各样的賭博場，虽然沒有公然設立娼寮妓院，但是却有几个“粉头”在鴉片烟館和賭博場合鑽进鑽出；有时在茶鋪里，在酒店里“打情罵俏”，誰也不敢无原无故去“挨”一下，因为誰也晓得都是陈大爷和陈大娘的干女。

陈大爷不只是袍哥大爷，据說，与外来的“青帮”也有关系，杜月笙到成都来的一次，他去拜見过来。因此，他有資格成为甚么“調統室”“稽查处”的一員，而在游干班受訓毕业，他的声光越是大了！

这几天，陈大爷突然变成另一个人。黑黢黢滿是橫肉的圓脸上，經常挂了副很不自然的笑意；見了人（包括那些平日滿不在他意下的土紳粮們）总是開門見山地說：

“共产党硬要打来啦，咯个搞呢？我們沒有資格象蔣委員長样，能够坐上美国飞机跑滩。……”

因为沒有人“搭白”，他又掉个話头說：“管他共产党不共产党，总之，保境安民是要紧的。”

大家不知道陈大爷受了甚么人的委托，要他担負起这个“保境安民”的艰巨責任。但是大家从以往的經驗，知道“保境”也罢，“安民”也罢，誰提出这句话，誰就有权利向他的“境”內的“民”要錢。

大家現在怕的，不是象陈大爷那般人平日說得那么怕人的共产党。怕的，是从东路从北路潰退下来的数不清的队伍，和成群結队的立眉豎眼穿着青呢中山装的鉄路交通警、內政部稽査处的特务人員；怕这些人随便騷扰，随便

逮人。更怕的，是要他們出錢，——不是半文不值的銀元券，而是响堂堂的嶄新的在美国鑄就的帆船紋或孙中山另一側面象的硬銀元。

听說陈大爷有这样一个計劃：把两个乡的靠近公路的几个保的团丁摀在手上来“保境安民”，約計有二百来人的确被几个保长和好多个甲长半拉半騙，来到这腰店小場外几家农民院子里过了一夜。但也只过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不見亮，这二百来人又各自散了回去。表面原因是陈大爷沒有办“招待”，保长甲长不热心；其实哩，誰也看穿了陈大爷的鬼把戏，不过想借用“保境”名义，抓点本錢在手上，备将来做生意。并且誰也相信，解放軍一到，世界都要翻个身；起碼，象陈大爷这类的“歪”人，总不致于再“歪”。为啥呢？因为蔣委員長都“乘不住火”，着解放軍打得“落荒而逃”，何况虱子大一个陈大爷。

南路消息也不大妙。胡宗南的大軍打了三天三夜，費了很大的劲，才打过新津。从龔門鋪到牛市口的公路，几天来都在过兵。有胡宗南的兵，也有罗广文的兵；有穿黃軍装的，也有穿灰軍装的；有步兵，也有炮兵；有从西向东开去的，也有从东向西开来的。甚至同一个大队伍，前天才向东走去，說是到龙泉山去設防，而今天又从东开回来，說是到南路去增援。

一种沉重的疲乏压在每个兵的脸上。有些人几乎是閉着眼睛在走路。有些人的眼睛只管睜着，可是眼珠都是鈍的昏的，不含一点希望光彩。

驻扎在場外不远一个农家大院里的路警，倒滿有精神。四十几个人全长得高一头窄一臂。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柄短刀，还有一支手枪。住了两天不到，把农家存儲的白米吃个精光；十只鸡、两只鴨、七八块預备过年的腊肉，都給做了下飯菜，还不滿意，还罵着打着要主人供应大糲酒。

大家都起了恐慌。有的去找陈大爷高大爷想办法。高大爷紧閉嘴唇不开腔。陈大爷搖着头說：“我已去交涉过了，不中用。我只有这几个得力兄弟伙，一共五支手枪，对付不来。調来的团丁哩，还没有集合就跑光了。你們找我，我有啥办法！”

办法还是想出了，据說是出于一个人力車夫的脑筋。

这車夫原是高店子一个小商贩，三年前被拉当兵，不知以何因緣，开到山东去作战。今年甚么时候被解放軍俘虏过去，因为想念家里无以为生的妻室儿女，受了三个月的教育，优待、穿上一身新衣，領了一张凭証和几块硬銀元，便从解放区走向。据他自家說：“解放区真是天堂，随便走到哪里，都有‘招待’。他媽的，一走到国軍地方，那就惨了。首先，把你关起来，拷問你是不是投降了共产党；把你磨得只剩一张皮，才一脚踢你出来。我在解放区养得肥墩墩的一身肉，及至流蕩到汉口，簡直变成一个骷髏。要不是同乡关系，一路赶黄魚回来，早已死在外头了。嗨！弟兄，光凭这一点，我就忘不了共产党！……”

这家伙回来四个多月，拉了三个月的人力車，精神很好，不管在甚么場合，只要你一問到他的經過，他就这样

高声大嗓子地说一气。曾经有人劝他：“说话谨慎一点的好！”他却楞起一双起红丝的眼珠说：“我还怕吗？”也因为那些可疑的人都不惹他，连陈大爷这般人也只带笑带骂“他龟儿是疯子”，所以有人便疑心“该不是特务故意叫他出来‘唱反调’，好套别人的口气罢？”

然而就是这个人，他给大家打了一个“条”，叫那农家主人到夜里悄悄给那伙“歪”人漏个信，叫他们“要提防”；因为听说高店子那头发现了戴八角帽的便衣队；又听说周围好几处民团都看上了他们的“家伙”（指冲锋枪和手枪），说不定今天夜里就会来惊扰他们。

按照那车夫打的“条”，大家本来纠集了六七十人（连妇女和半成人的大孩子都在内），也借了团上几支仅仅打得响的破枪，准备在四更头里，趁着公路略为清静时候，藏到距那农家院子不甚远的竹林里，打几枪，吆喝一阵，吓他们一下的。“这伙人，别看他们那么神气，其实都是胆小如鼠，吓一下，保险就会溜走的。”

谁也没料到这伙“歪”人，真着那车夫看透了！并且等不到大家“兴师动众”冒着寒风微雨去打“呵嘞”，只经农家主人轻轻一説，他们便惊惶失措地提起行李，向牛市口奔去。无疑的，他们还一定会宣传高店子这头，已经发现了共产党便衣队了。

公路上汽车和军队来来往往，天空中也一样，各式各样的飞机，几乎是日日夜夜地在轰鸣。那不是为了练习，也不是为了侦察，更不是为了轰炸、作战。谁也知道，那

是載運逃亡的人，——從蔣介石、閻錫山起這般惡魔，和為他們而甘心作惡的大小特務，和被他們劫持而去的少量隊伍。聽說也有物資，新近由各銀行括取的黃金，就是其中之一。

飛機飛得最勤的幾天，成都城內內外外也最為混亂。甚么第一路反共救國軍，第二路反共救國軍，青年反共游擊隊，人民反共自衛隊……都明目張胆而又躲躲藏藏地組織起來。這個腰店小場上的陳大爺，好象也活躍起來。有幾天功夫，沒有看見他在場上吃茶，連同那些“護腳毛”，也好象失了蹤。

直到這一天，腰店小場上扎滿了說是從北路退下的一伙四川軍隊，也不知道是楊森丟掉的衛隊呢？還是甚么人帶的保安團？總而言之，這伙人却大異於胡宗南的隊伍。他們的特点是：無論遇見甚么人，總是滿口“性罵”，幾乎除了“性罵”，就無話可說；其次，行動是充分自由，一到場上，儼然就是來了一群瘋狗，見鋪子就鑽進去駐扎；再其次，通共二百人不到，挑担倒有四十來根，滑竿有十幾乘，担挑子的，抬滑竿的，都是沿途拉的農民。尤其使人詭異的，滑竿抬來的，還有五個年輕女人；最初大家認為是軍官眷屬，不久弄明白了，原來是隨著他們跑灘的“花姑娘”。這伙人只管牢守着往昔川軍的習慣，可是已經吓唬不了這個腰店小場的人民。他們開口罵人，大家也開口回罵；他們朝鋪子里亂鑽，大家便把他們轰出來；他們要別人騰出臥房給“花姑娘”睡覺，大家却鎖上房門不答應。

他們沒計奈何，便變更口气問人：“你們为啥这么歪？”

答应是：“戴八角帽的已經过了高店子了！”

这比王道灵的灵符还灵。这群狗一下就不疯了，滑竿也不坐了，挑担也不要了（因为拉的伙一到場上便跑个干净），尽各人气力把挑担上的东西背上，挟起“花姑娘”便向西跑了。大家說：“痛快！痛快！比那些穿青呢中山服的路警还跑得溜刷！”

就在这时，西南方轰天的爆炸声忽然接連不断地震响起来。

“有这样的火炮么？”人們很是怀疑。

当然不是大炮。因为轰响到半夜，使人越发明白，——每大震一声，西南方黑夜沉沉的天边，总要发出一道耀目閃光。“呵！是在破坏新津飞机场了！”

这无异是向从南、东、北三路合围而来的解放軍鳴放的礼炮！

这个腰店小場上的人——除了陈大爷那一小撮的人外，——几乎欢喜得一夜不眠。

十年过去了。

这十年的变化真大！这个腰店小場，不但“面目全非”，而且“脱胎换骨”。場上已沒有一家私营商店，已沒有一个抄着手不做事的閑人、空人。但是場上却有一家規模不算小的百貨商店，却有三家性质不同的食堂，却有一家出售日用品和农具的分銷店，却有一家出售副食品的

合作分社，却有一家縫紉店、两家照相館、两个卖肉卖菜的市場、两家茶鋪、两家理发店，甚至还有一家耐火器材厂。一言蔽之，它也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跃进哩！

場外的变化，那更不必說了，——大得很！

象陈大爷那一类型的人，就点起灯籠也早找不到了。

至于陈大爷本人，如其真个“再世当个好人”是属实的话，他應該九岁了罢？

〔选自《峨眉》1959年10月号〕



夜 渡

——回憶一位无名的老船工

林 如 稷

最近在《四川日报》上看到一則題名“千里送亲人”的报道（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記述一位孤身困在重庆多年有病的七十五岁老太婆，由于重庆港务局客运站职工同志的負責和热情的照料，能以順利地回到远住在上海一个仅有的亲人那里的經過，使我又一次生动地感到新中国真是人間乐土，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更是何等新而有情！同时，这也使我再忆起一篇叙述我在三十多年前一次旅途中的故事的旧稿，自然，这不仅只是为了偶尔的一点联想，而是在那件往事中所涉及的一位老人留給我的印象，真真是太深了呢。

* * *

在旧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代里，仅只在我个人那四十几年的生活历程当中，所遇到过的危险事件也就不少，但使我至今有时一想起还不免要大为激动的，总须算一九二二年夏天，我从北方回四川，路过巫山的那一次夜渡长江了。

说起巫山，因为在古代诗人们笔下有过许多神话传说的渲染，一般人自可能会要引起富于奇趣的浮想的。不过，我现在要记述的，却只是一件平凡的小事。这是那一年炎热季节，我在北京生病的母亲要回四川去，我由上海转到北方，在又一次的“直皖军阀混战”以后，京汉火车交通刚刚恢复之时，伴着她南下经过汉口，再溯长江西上。我们从宜昌换上航行川江的“福源”轮船，在船上认识了一位姓王的云南人。他年纪大约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庞瘦而狭长，眉眼看来倒不怎样异常，只是那上面总好象是浮现着一种黧黑气色，不令人生快感的。说话也常是粗声莽气，然而很健谈。就在初次攀谈中，我便知道他是在当时称霸西南的滇军中当着连长之类的职务，这次却可说是“微服出行”，护送几位正盘据在四川的滇黔大军阀的眷属，由云南绕道越南经由上海再转到重庆去。在旧中国，大家都深知道有种种的“行路难”的；而那时的“蜀道”，除去自然条件的困难险恶以外，又正由于多年的兵连祸接，真是弄得远行人有步步艰危之叹呢！何况我的母亲早在患病，我自己又还是一个初涉世途的才二十岁的青年人。因此，我对于这位萍水相逢的“老江湖”壮士，在无